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

主编 林继富

北京牛街回族民俗研究

王卫华◆主编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

主编 林继富

北京牛街回族民俗研究

王卫华◆主编

马骁 张志芹 刘东亮 穆天乐◆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京牛街回族民俗研究/王卫华主编;马骁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1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林继富主编)

ISBN 978-7-105-12647-7

I. ①北… II ①王… ②马… III. ①回族—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研究—北京市 IV. ①K892.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5525 号

北京牛街回族民俗研究

策划编辑:欧光明

责任编辑:李燕妮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195 千字

印 张:16

定 价:40.00 元

ISBN 978-7-105-12647-7/K·2188 (汉 122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总 序

中国现代民俗学建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成为学人关注的对象。20 世纪 40 年代，由于战乱，大批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道路，进入我国的西南彝族、白族、苗族等地区调查，在此过程中搜集和采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俗。比如，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吴泽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与陈国均合编）、《贵州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等。这些著作中记录的民俗是众多知识分子为了了解西南民族生活，在明确学科意识基础上调查采集的成果。通过他们的努力留下 20 世纪 40 年代西南少数民族宝贵的民俗传统，留下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在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与国家文化保护和文化发展紧密相联，并且在众多学人脚踏实地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民族识别带来少数民族民俗的全面搜集、记录和整理。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主要时间集中在1950—1964年，到1983年加上原来已经公认的民族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分。这个时段的少数民族民俗搜集、记录是为民族身份识别、确认服务，存在价值判断的选择性和政治需要的方向性，它很少考虑现代学术的体系性和内在结构的规律性，它更多的将民俗作为佐证身份的材料和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为了强化少数民族身份，在民族民俗采录和发掘的过程中，一些带有标志性的民俗被反复运用、改编和宣传，这些民俗几乎成了该民族的文化符号了，诸如彝族撒尼人的《阿诗玛》、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藏族的格萨尔等。这些民俗传统成为今天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重要内容，也开启了民族文化品牌建设的序幕，尽管是不自觉的文化行动。

从1979年开始，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集成》等十大文艺集成的工作，十部集成均按现行行政区划立卷，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台湾省）各一卷，这其中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民俗传统。“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目的在于全面搜集和记录流传在广大乡村的民间文化。这个活动同样是政府主导的文化行动，围绕民间文化搜集和记录展开，目的是较完整和系统地保留中国民俗

文化，因此，全面性、科学性和代表性成为这次保护民俗传统活动的明显特点。

进入 21 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自此，以民俗学为代表的学人开始大量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并且结合中国学术经验而不断消化，使之逐步本土化，以此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中，主要内容是针对收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传承人等开展的调查、申报、评审、确认、保护与研究活动，少数民族民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引起了世界的重视，截至 2009 年，中国已有 29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侗族大歌、格萨（斯）尔、热贡艺术、藏戏、玛纳斯、花儿、朝鲜族农乐舞、蒙古族呼麦等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现代民俗学直到 21 世纪初，中国民俗学的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因此，清理和研究记录下来的文字化的民俗传统成为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传统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加速了民俗传统的变异与消亡，这种令人堪忧的状况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传承的民俗来说尤为突出。因此，加强对中国少数民族民俗传统的发掘、搜集、记录和整理成为当今中国学人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的重要基地。学校

在建立之初，就有大批学者致力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为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立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的历史资料。在民族学、社会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支撑下，积极探索了新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杨成志、马学良等专家直接参与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重建；学校汇聚了大批熟悉民族历史文化、精通民族语言文字的民俗学研究专家，为本学科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央民族大学向来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中央民族大学的许多教授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界精英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立的坚实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的工作，中央民族大学的马学良、陶立幡、李耀宗等学者成为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歌谣集成等卷本方案的设计者、执行者和领导者。进入 21 世纪以后，国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专家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如陶立幡、祁庆富、邢莉、林继富等均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专家，积极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之中。所有这些，表明了中央民族大学对少数民族民俗传统和少数民族民俗生活的高度重视，也成为民俗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前进的方向。2011 年开始，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在国家“985 工程”支持下，积极投身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运动中来，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因成绩突出，2012 年获得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的称号。

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下，在“211工程”、“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在方向凝练、学术创新、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实力进一步提升。2000年建立民俗学硕士点，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形成了三个特色鲜明的学科方向：一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方向通过对各民族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变迁的研究，在构建一国多民族民俗学理论体系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着力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建议；二是少数民族口承文化研究，本方向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口承文学史、民族民间叙事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三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价值转换与文化创意研究，本方向重视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价值认知、价值转换模式、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多年来，本学科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统一的研究范式，致力于推进多元一体的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建设，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提供了智力支持。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着力研究中国55个少数民族民俗，在借鉴已有国内外民俗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理论体系，开拓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志调查与写作研究、中国民间叙事及其传承人考察、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时间调查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俗与民族认同研究。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师生正在以脚踏实地的田野精神，以开拓独特的学术路径，为民族地区和谐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服务。

为了让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师生以及与之相关学界同仁在调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的成果时，能够更好地、更快地惠及国家文化建设、惠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惠及更多的学界朋友，推进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我们组织了“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书系侧重于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师生调查研究成果，偏重于选择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著作。在行为上以田野调查的现在性记录和实证性研究，提出少数民族民俗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命题；在观念上表达学人对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的见识和理解；在目标上达到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和谐发展，充分理解中国少数民族生活及其文化。

组织以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的图书，既不是从我们开始，更不会止于我们的努力。相信在“文化大繁荣、文化大发展”的当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参与到少数民族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行列中来，我们愿意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俗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仁携手共进！

林继富

2012年12月

北京·魏公村

前 言

“北京牛街回族民俗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该项目从少数民族为北京市文化多样性建设所作贡献的角度，考察北京牛街回族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力图探究首都北京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都市民俗学已日益引起民俗学者的关注。一个成熟的城市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其居民在日常生计、饮食起居、人生礼仪、节日休闲等方面，都会受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从而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都市民俗。反过来都市民俗又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品味和人文魅力，成为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随着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大，都市民俗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已不容忽视。城市居民是民俗的传承者、建设者，也是民俗的享用者。民俗在把都市人联结成

一个市民整体的同时，也调节着市民与都市的关系，并把市民的生活引向一个合理而有序的秩序之中。作为大都市，民俗应该是多元的。多元一体和谐发展的都市民俗是建立城市文化的理想模式。民族特色则是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北京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缩影，56个民族中都有人在这里生活、学习和工作，他们都对北京的民俗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是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兼容并蓄的综合体。这种多元一体性特征，又构成了其独特性、丰富性和高品位的“极致性”。^①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北京，对外是我国民族关系的窗口，对内是维系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心脏，不同民族民俗在北京的多样性存在与发展是展示其文化胸怀的良好平台。

少数民族在北京居住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其中人口较多的回族、满族和蒙古族各有自己以街道、乡或村为单位的聚居区。在这些民族聚居区，其民族民俗才有可能较好地传承、发展下去。

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的牛街，是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回族聚居社区。牛街的回族居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受到了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风俗的影响，又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参与了北京的民俗建设。1949年以后，牛街就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展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保存得较为完整的民族风俗是北京都市民俗多样性的典型展示。

回族文化最外在的表现即是其独特的民俗生活。回族作为中国有

^① 参见刘军：《试论少数民族对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4）。

着千年历史的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务实变通的灵活性，积极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儒家文化的一切可取之处，主动地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文环境。^① 在实际生活中，其语言服饰、生计方式、居住地域等民族特征并不明显，他们便在民族意识的支配下，加强了传统习俗的传承，并由此形成整套的信仰、礼仪、饮食、婚丧、节日等民俗生活，以此作为回族独特的生活方式，达到民族认同、民族“自识”与“他识”。^② 回族的民俗生活成为日常生活规范的具体化，人们往往通过一个人对其民族民俗生活遵守的程度来评价他的民族自我意识。回族人则在参与民俗生活的过程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上的满足。牛街的聚居模式为生活在北京的回族民众提供了创造、传承和享用民俗的理想空间。

但是，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牛街也面临民俗传承的困惑。1997年牛街危改一期工程开工，2000年牛街危改二期工程上马。两次危改工程使得牛街及附近地区的危房大多被拆除，传统意义上的“胡同”基本消失。2003年，长670米、宽40米的新牛街大街建成通车，宽阔的道路使原本较为狭窄的街道具有了明显的现代色彩。随着旧城改造的推进，回族聚居的居住格局发生改变，回族人口进一步分散于全城的各个角落。聚居的居住格局的变化带来的是寺坊制的终结，曾经兴盛一时的寺坊制社会结构在中国的都市里正逐渐消失。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忧虑：都市回族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营建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存续他们的文化，保持他们的认同？^③

① 参见马平：《多元通融的回族文化》，33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② 参见杨志娟：《回族传统节日文化意义探析》，载《回族研究》，1999（2）。

③ 参见周传斌、马雪峰：《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载《回族研究》，2004（3）。

北京牛街回族民俗研究

“北京牛街回族民俗研究”项目立足当代北京回族民俗生活，从宗教信仰、岁时节日、物质生活、人生礼仪等角度，分别选取清真寺、圣纪节、饮食和婚礼四个方面进行调研，关注的重点是回族在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是如何延续自己民族的民俗传统，从而既保持民族特性，又融入现代都市生活之中。

空间概念的“牛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牛街街道。其辖区是西城区内东起菜市口大街，西至广安门南街，南起南横西街、枣林前街，北到广内大街，其面积 1.41 平方公里，包括牛街、菜市口大街、白广路、南线阁、广安门南街、广内大街 6 条主要大街、26 条胡同。另一个是回族聚居意义上的牛街。它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街，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点、居民大多为回族民众的一条真正的“街”。本项目所涉及的田野调查点是后一意义上的牛街。

本书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力图以第一手资料，写出当代牛街回族民俗志，既深描牛街回族民俗的现状，也展示其发展趋势；在为民俗学学科增添研究资料的同时，如能为北京市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参考，则大为欣慰。

编者

2011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牛街礼拜寺现状及功能	1
第一节 牛街概况	1
一、牛街名称由来	2
二、牛街回族聚居区	7
第二节 牛街回族宗教文化背景	9
一、作为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	9
二、牛街回族日常宗教生活行为	12
第三节 牛街礼拜寺概况	24
一、牛街礼拜寺的历史沿革	24
二、牛街礼拜寺的建筑	26

三、牛街礼拜寺的管理体制	43
四、牛街礼拜寺的寺藏文物	50
第四节 牛街礼拜寺的民俗文化内涵	53
一、伊斯兰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53
二、宗教信仰活动的场所	55
三、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托	59
四、回族人的精神家园	61
五、对外交往的桥梁	64
第五节 牛街礼拜寺的民俗文化功能	66
一、礼俗规范与文化遗产	66
二、调整角色与适应社会	70
三、民族团结与民族认同	72
结 语	77
 第二章 牛街礼拜寺圣纪节纪实	 79
第一节 圣纪节时间的确定及告知	81
第二节 圣纪节仪式的参与者	84
第三节 圣纪节仪式过程	92
一、圣纪节前期准备	92
二、进场与捐献乜贴	94
三、做大小净	100
四、进殿听讲卧尔兹	104
五、会餐	106
结 语	111
附录一 2011 年圣纪节卧尔兹摘录	112

附录二 关于圣纪节油香和肉粥制作方法的访谈录	119
第三章 牛街清真饮食习俗	122
第一节 清真饮食的起源及北京市清真饮食的发展	122
一、清真饮食的起源与发展状况	122
二、北京市清真饮食的发展沿革	124
第二节 “清真”及清真食品的内涵	129
第三节 北京牛街清真饮食	131
一、牛街清真饮食的发展	131
二、牛街回族清真饮食分类	133
三、牛街周边的清真饭店及小吃店	163
第四节 牛街回族的饮茶习俗	168
一、回族饮茶习俗传承	168
二、牛街回族的饮茶习俗	169
三、牛街回族饮茶习俗的特点	171
第五节 牛街回族清真饮食及食俗的特色	172
一、牛街清真主食及菜肴的特色	172
二、牛街回族清真饮食文化的特色	175
三、牛街回族群众饮食选择的特点	177
结 语	179
第四章 牛街回族的婚俗	180
第一节 回族婚俗背景	181
一、伊斯兰教婚姻制度	181
二、回族婚姻制度	189

北京牛街回族民俗研究

第二节 牛街回族婚姻习俗	191
一、牛街回族传统婚俗	191
二、牛街回族婚俗的现代变迁	199
三、牛街回族婚俗变迁的原因分析	218
参考文献	225
后 记	239